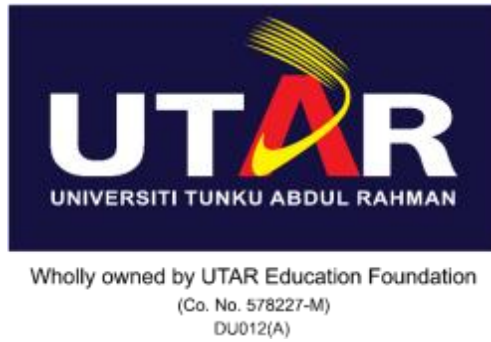




千年古寺神通寺文物遗存与现状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current status of the ancient Shentong Temple.

苏浩杰

SU,HAOJIE

22ALB03385

指导教师：杜忠全师 / 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6 SU,HAOJI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录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2
第三节 研究综述	3
第四节 研究方法	5
第五节、研究难题	6
第二章 济南神通寺的历史背景与分布	7
第一节 北魏初创，佛教东传与寺院雏形的初步形成	7
第二节 隋唐时期，佛教鼎盛与文物累积	9
第三节 宋元明清，传承延续	12
第四节、现代化转型	15
第三章：神通寺文物遗存与当代发展现状	18
第一节 文物遗存保护现状	18
第二节 佛教文化的传承现状	20
第三节 文旅融合发展现状	22
第四章 结语	25
参考资料：	26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
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苏浩杰

姓名：苏浩杰 SU, HAOJIE

学号：22ALB03385

日期：2026年4月12日

摘要

济南神通寺作为山东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寺院，其历史脉络绵延于齐鲁佛教文化与地域社会发展的历程之中。神通寺始建于东晋时期，原名朗公寺，是佛教东传至齐鲁地区的重要枢纽以及山东地区的佛教中心，也是佛教中国化在山东地域实践的核心实物见证，历经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毁坏与重建，见证了佛教东传至齐鲁地区的全过程，神通寺虽多次遭受战乱，灭佛运动的损毁与重建，仍留存有四门塔、千佛崖、龙虎塔等核心文物遗存，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文化与齐鲁本土文化融合的内涵。围绕这一延续千年的古寺遗存，后世的文献记载与历代重修活动相互交织，最终目标均在于推动济南神通寺文物的活态保护与佛教文化的当代延续。神通寺以跨越千年的物质遗存与活态传承，深深地刻画出佛教中国化在山东地域实践完整的历史脉络，神通寺的保护与传承实践呈现出历史维度与现代面向深度交融的显著特征。

由此，后世关于佛教文化的保护理念与路径的各类学术中的探讨，都可以从神通寺这一典型的案例中获得具体而微的经验参照与理论上的启发。其次，真正的保护与传承，不仅着文物遗存本体物质的延续，更致力于使其在当代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生活语境中重新激活本身的价值，从而有效推动佛教文化的持续演进与活化再生。

【关键词】：神通寺、文物遗存、现状分析、佛教文化、传承

致谢

总觉得来日方长，毕业遥遥无期，却发现我的拉曼大学生涯也即将接近尾声。毕业论文已成为我大学三年的最后一个段落，心中充满感慨和感恩，求学途中有同学和老师以及朋友的帮助和陪伴，让我的大学生活充满乐趣，顺顺利利的走向今天。在此，我真心实意地向每一位给予我关怀、帮助过我的人，道一声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我衷心感谢的是我的指导教师杜忠全老师。从论文的选题构思、框架搭建，到研究方法的确定以及具体内容的修改，每一个环节我都曾陷入迷茫，杜老师的耐心指导与渊博深厚的专业学识，不仅为我的论文写作指明了方向，更将成为我未来学习与工作中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师恩难忘，铭记于心。

同时，感谢学校的各位任课教师与学院领导。老师们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掌握了专业知识与研究方法，课余时间，为我解决了学习和生活中的诸多难题，让我在求学途中得以稳步前行。感谢在我大学的生活中遇到所有的老师，感谢老师们给予我的所有帮助。愿老师们万事顺遂，桃李芬芳。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最坚实的后盾，始终给予我无条件的支持，承担着生活的琐碎与辛劳，用爱为我撑起一片天地。是他们在我的经济上提供了足够的支持，让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世界，就是因为他们无条件的爱，我才有了独自踏上异国他乡的勇气。问我什么是爱，记得出国前爸妈与我道别，说让我在外吃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别亏欠自己，照顾好自己，我虽故作轻松的说别太想我，但挥手转身说再见的时候，回头看他们在偷偷抹眼泪，眼睛里早已朦胧。我无法定义什么是爱，但是爸爸妈妈他们给予我无条件的支持与包容，是我一辈子的底气。我将永远铭记于心，用实际行动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

此外，我将会感谢参与本论文评审与答辩的各位老师，也感谢你们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帮助我进一步完善论文。

最后，我也感谢那个不完美但勇敢的自己，感谢亲爱的老师们，感谢我大学三年互帮互助的朋友们，感谢相遇。谨以此文，祝愿老师们学术之路行稳致远，硕果常新，也愿我们前程似锦，万事顺意。

第一章 绪论

在中华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古寺作为佛教文化的核心载体，保存下来的各类文物遗存，是历史文脉延续的一个重要见证，这会承载着古代建筑、雕刻、艺术等多重文化价值，对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山东济南神通寺作为山东佛教文化的发祥地，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留下来的文物遗存丰富且价值突出，这些文物的保存状况和传承发展，直接影响到齐鲁地区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

本研究以神通寺文物遗存为对象，系统地梳理文物遗存的特征，通过文物现状的调查，进一步地了解济南神通寺真实状况与关键价值。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神通寺坐落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是山东佛教文化的重要地标之一，是具有“齐鲁第一古刹”之称。在中国的大力推进文化自信建设，加强深化文物保护与现状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已经从宏观理论探讨逐步转向每个区域的精心探讨了，成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重要路径。山东济南作为齐鲁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不仅仅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还依然保存着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是华北地区佛教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枢纽。神通寺作为山东省内现存最早有明确记载的佛教寺院，始建于北魏，初名为“朗公寺”，隋代敕改称“神通寺”，历经千年兴衰，至今留存有四门塔、千佛崖等国宝级文物遗存。这些遗存不仅是佛教建筑本土化的早期实物见证，也

完整记录了从隋至明清时期齐鲁地区佛教传播与文化融合的历史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

从佛教角度来看，神通寺是佛教是中原传至齐鲁地区的重要据点。神通寺内留存的文物遗存，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思想的传播过程以及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事实，其中凝聚着“禅净双修”等佛教核心理念，是当今传承佛教文化，发扬佛教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神通寺上千年来的佛教传承，不仅体现在佛塔和造像等文物遗存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上，也体现在延续至今的禅修实践和向善理念中。这些精神传统对当代人来说具有实际价值有助于缓解精神压力，促进内心和谐。同时，济南神通寺也是佛教文化主动适应现代社会，实现自身当代转化的重要实践场所。神通寺既是佛教在山东地区的活化石，也是佛教的智慧介入当代人精神生活的链接，能够证明佛教不是只存在于经书和博物馆里的旧学问，而是可以通过古代的建筑、造像和修行产生的影响。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文研究济南神通寺以及寺内的文物是因为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寺庙从不同角度来折射出中国古代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的特征。随着近年来佛教中国化这个话题在学界越来越受关注，相关讨论慢慢延伸到各个地方佛教的具体发展上。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长期以来研究人员讲山东的文化，基本都绕不开儒家思想，导致山东深厚的佛教文化积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齐鲁大地的佛教传承历史悠久，神通寺是山东济南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寺院之一，始建于北魏皇始

元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的变迁，留下了四门塔、龙虎塔、千佛崖等一系列珍贵的文物。其中，隋代四门塔是中国现存唯一的石质佛塔，龙虎塔和千佛崖的雕刻艺术堪称中古佛教艺术的代表之作，是佛教中国化进程在齐鲁地区落地、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关于神通寺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地方志里的零散记载、旅游宣传的浅层介绍，始终缺少一套能够贯通其历史演变和当代价值的研究。

本研究以神通寺为核心，立足其千年发展脉络与现存文物遗存，以神通寺的历史演变为线索，结合文物遗存的年代、形制与工艺特征，解析神通寺建筑艺术、现代的改造路径，填补齐鲁地区早期佛教寺院系统性研究的空白。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梳理，了解神通寺文物遗存与当代社会的互动关系，说明佛教文化对山东社会发展的深层影响。聚焦当下神通寺的现代化的转型，分析其在文物保护、文旅开发中存在的核心问题。通过对神通寺的个案研究，了解山东佛教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的普遍规律，推动佛教中国化区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节 研究综述

神通寺是山东省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佛教寺院之一，对佛教传播、文化融合及现状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济南神通寺有着千年古刹之称，经过千年的积淀，充分了解济南神通寺的历史脉络，文物的核心遗存依然保持良好，不断地推动佛教文化，核心文物研究方面重点是围绕四门塔和千佛崖等核心遗存展开，姜继兴在《四门塔的历史》中，系统梳理了四门塔的历史沿革，明确了其作为我国

现存最古老单层亭阁式石塔的历史地位与文物价值。张丽在《四门皆菩提》中，进一步挖掘了四门塔的文化内涵，将其与佛教教义相结合，丰富了核心文物的文化解读，何佳谦在《唐代佛塔的艺术表现-以山东神通寺龙虎塔为例》中，聚焦龙虎塔的唐代雕刻工艺与艺术特征，剖析了其在唐代佛塔艺术中的独特地位。王建浩在《山东济南市神通寺殿堂遗址的清理》中，详细记录了济南神通寺遗址的考古清理过程、出土遗迹与遗物，为济南神通寺的遗址的年代考证、形制复原及保护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依据。靳桂云在《王献唐先生对山东文物考古事业的贡献》中，梳理了王献唐先生在山东文物考古领域的实践与贡献，间接为神通寺文物考古研究的历史背景提供了补充，凸显了山东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对神通寺文物保护的支撑作用。佛教背景研究方面，公维章、张梅在《僧朗与泰山佛教史事编年》中，梳理了僧朗与泰山佛教的关联，间接印证了神通寺作为泰山佛教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地位，为神通寺佛教文化的溯源提供了重要参考。王继训在《北魏齐鲁佛教世俗化的展开》中，探讨了北魏时期齐鲁地区佛教世俗化的发展历程，为解读神通寺佛教文化的时代特征、传承脉络提供了区域背景支撑。寺院兴衰与教义传承方面，释界空在《从神通寺兴衰史看崇俭戒奢的意义》中，结合神通寺的兴衰历程，挖掘了佛教“崇俭戒奢”教义的当代价值，为佛教文化与当代社会的适配性提供了实践思考。广声在《以佛陀的慈悲和平精神为指南、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中，阐释了佛陀慈悲和平精神的内涵，为神通寺佛教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了理论导向。陈明超在《神通寺旧闻》中，通过梳理神通寺相关历史轶事，丰富了佛教文化的传播载体，为文化传承提供了鲜活素材。

神通寺作为山东地区第一座佛教寺院、济南佛教祖庭，拥有四门塔、千佛崖等重要文物遗存，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神通寺的存在不仅承载着隋唐时

期佛教建筑与造像艺术的精髓，传承了千年的佛教文化，构建了山水禅意的独特生态景观，更成为济南南部山区文旅带的重要节点，推动了区域文旅发展与佛教文化传播。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是关于神通寺的文物遗存与现状分析，通过调查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观察研究法来详细的了解佛教从古至今的发展轨迹。

调查研究法就是通过去神通寺精准测量，更深入的去了解寺庙。可以弥补文献的缺失，通过实地了解寺庙的遗址布局和记录残存的文物细节来证实佛教的理念，将文物的实测数据进行研究，通过访谈僧侣、居士、当地长者和文物的管理员，收集口述历史从而了解佛教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展。这种方法能够结合历史遗迹、实物与现实的宗教活动，从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使研究的结论更加全面和客观，不仅提高对寺庙的文物遗存研究，更要保护现在留下来的遗留文物，能够了解这些文物的遗存与现状的文旅发展存在怎样的影响，如何推动现代的佛教文化，从而获取具有独特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文献综述法是通过了解前人所研究整理的相关佛教理念来了解神通寺的历史脉络，通过查找和分析这些史料，可以把分散的记录拼在一起，勾勒出寺庙的历史故事，也为之后的实地调查提供了方向和依据。将不同文献对同一事件的记载进行比对，梳理出寺庙从古至今的演变过程，使我们的后续研究推动其向前发展。

观察研究法就是将静态的文物转变成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自己的感官研究寺庙以及文物，并且亲自去感受寺庙与文物的材质和环境，发现出前人没有记录出的细微痕迹，观察寺庙所处的环境，细致的观察寺庙与文物的整体布局。强调对神通寺现存遗迹的细致审视。通过对造像的凿痕、衣纹的线条与建筑构件的细致观察，能够深入了解从古至今寺院、宗教与文物的历史脉络。

第五节、研究难题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结合济南神通寺文物遗存与佛教文化与现状的实际情况，面临着几方面核心研究难题，这些难题既源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也受限于研究条件与研究方法的客观约束，神通寺历经千年损毁与重建，历史信息与佛教文化内涵呈现出碎片化。

同时，现有考古资料和文物遗存的记载较为零散，难以完整的还原寺院的演变过程，难以发掘出文物遗存的梳理和文化价值，其带来较大难度。佛教文化的当代传承是兼具主观性与隐性特征，其成效难以借助具体的数据进行准确标准。本文对神通寺现状的分析，多依赖于去现场的观察，难以建立客观以及全面的评估框架，使佛教文化传承现状的研判不够精确和深入。

神通寺同时承载文物保护、佛教活动开展等，其之间的发展目标存在内在张力，使得实现多方面协同平衡面临较大难度。这一研究需要以零散的历史文献与残缺的遗存信息为依据，能够有效的结合文物本体保护、佛教文化传承等维度，以避免叙事流于表面的描述，由个案考察向普遍经验的理论提升，对于研究的理论整合能力提出了更深层的要求。

第二章 济南神通寺的历史背景与分布

第一节 北魏初创，佛教东传与寺院雏形的初步形成

北魏时期是佛教东传至齐鲁腹地的关键阶段。初创时期，这一阶段的佛教传播与时代背景紧密交织，为神通寺的创建与初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自西汉末年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传播与融合，佛教已经不是外来宗教，而是，开始与中原传统文化产生碰撞与融合，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肉之中，尤其在南北朝时期，佛教成为安抚民心的重要精神工具，北魏统治者更是实施“崇佛”政策，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政治支撑。¹道武帝拓跋珪和明元帝拓跋嗣都支持佛教。虽然后来太武帝时期发生了短暂的灭佛运动，但文成帝即位后迅速恢复佛教的地位，推行崇佛政策。等到孝文帝来到洛阳后，佛教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大，逐渐从中原核心区域扩展到儒家文化主导的齐鲁地区，打破了“儒风独盛”的文化格局。这些都为神通寺的创建奠定了良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

神通寺始建于前秦皇始元年（公元 351 年），由高僧竺僧朗（朗公禅师）主持创建，最初命名为“朗公寺”，在山东济有明确的记载的最早佛教寺院，初创时期的朗公寺，规模是较为简约，没有完整成形的寺院格局，核心建筑是以简易禅房和佛堂为主，大多数为土木结构，主要用于僧众修行、传法与居住。初建后得到了统辖山东北部地区的南燕主慕容德的大力帮助，将奉高（今长清）、山茌（今泰安）二县的赋税划拨给朗公，以资发展佛教，同时还封朗公为“东齐王”。

¹ 王继训，〈北魏齐鲁佛教世俗化的展开〉，《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页 11。

这一时期，是朗公寺第一次大发展。²可以看出朗公寺的初次创建，是佛教突破齐鲁儒家文化壁垒的标志性事件，其发展历程与高僧朗公的佛教传播实践密不可分。在佛教东传的浪潮中，朗公受师命携佛教教义东行，辗转至齐鲁地区，最终选址于泰山北麓的昆瑞山（今神通寺遗址一带）建寺。³这一选址非常有深意，济南神通寺一方面可以远离世俗城镇的喧嚣，也契合了佛教“清净修行、远离尘嚣”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托四周山峦环抱、泉水潺潺的自然条件，营造出“依山傍水、清幽静谧”的修行氛围。这种格局，与神通寺后来形成的“左青龙右白虎”佛域风貌，已可见某种早期的呼应。

北魏的朗公寺发展得到了地方士族与民间信众的广泛支持，逐步从简易的修行场所，发展为具备基本规制的佛教寺院。初期的朗公寺仅建成简易的殿堂、僧寮与禅房，殿堂基本是以木质结构为主，形制非常简约，主要用于僧众诵经、禅修与教义宣讲，僧寮则是为僧众提供日常居住与修行的空间，整体规模较小、规格较为简单。随着信众数量的不断增加，朗公寺逐步扩建，新增了简易的佛坛、经堂等建筑，初步就形成了“依山而建、错落布局”的空间雏形，建筑布局遵循佛教寺院的基本规范，同时结合山体地形特点，未进行大规模的山体改造，这一时期的寺院，主要功能还集中在僧侣修行和教义传播上，虽然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建筑群，也没有留下太多文物遗存，但已经为神通寺在隋、唐时期的鼎盛发展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北魏时期齐鲁一带开始流行开凿摩崖造像，而神通寺周边石料资源丰富，这为后来千佛崖等造像遗迹的开凿埋下了伏笔。可以说，这种寺院选址与自然资源的紧密结合，正是佛教东传过程中的一个体现，也折射出“天人合一”理念在早期佛教实践中的某种落地。从此，佛教在山东地区落地生根，

² 刘继文，《济南神通寺》（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页6。

³ 公维章，张梅〈僧朗与泰山佛教史事编年〉，《泰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页15。

与当地传统文化开始相互融合。这一过程也为后续佛教建筑和佛教文化得以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第二节 隋唐时期，佛教鼎盛与文物累积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阶段，也是神通寺的鼎盛时期。国家宗教政策的支持，为寺院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与物质保障，推动核心文物遗存系统性地成型与积淀。神通寺由此成为山东地区佛教文化的核心枢纽，并在佛教中占据重要地位。隋代时期开始，朗公寺受到皇室的重视与扶持。隋文帝杨坚的出身背景，对佛教尤为尊崇。相传他曾梦见母亲的故乡在济南，后来在当地寻得失散多年的亲族，遂深信此乃佛缘。于是，在开皇三年（583年）下诏改朗公寺为神通寺，以应神灵感梦之缘。开皇十五年，又命其子河南王出任神通寺施主，资助寺院兴修。至仁寿三年，文帝更敕令法瓚送舍利供奉于神通寺，以隆其佛事。⁴隋文帝颁布诏令，向全国三十州赠送佛舍利，令各州建造舍利塔供奉，神通寺有幸获得舍利赏赐，并奉旨建造四门塔用于供奉。⁵四门塔就此建立，塔的四面的正中央分别有设券门，里面设有地袱、立颊。四方四面佛，佛面慈悲，淡然宁静。该塔由塔身、塔檐、塔顶及塔刹四部分构成。佛塔通高 15.04 米。塔身以大块方整青石砌筑。塔檐用青石块叠砌而成，分上下两部分，下面五层，向上每层挑檐渐大，塔檐呈弧线形。上面部分由二十三层的方整青石板层层叠筑而成，轮廓线条优美，顶部为四角攒尖方锥形塔顶，塔刹的露盘为方形束腰须弥座式。置于露盘四角边上的，是用青石雕成的山华蕉叶。相轮为五层圆形结构，位于露盘正中。最上面

⁴ 刘继文，《济南神通寺》，页 7。

⁵ 张丽，〈四门皆菩提〉，《走向世界》2013 年第 8 期，页 54。

呈柱状的是宝珠，宝珠是置于相轮之上。⁶四门塔把印度佛塔和中国传统亭阁的特点融合为一起，不像外国佛塔那样装饰繁华，充满隋代建筑风格，济南神通寺既是佛教建筑中国化的里程碑，也是神通寺最核心的文物遗存，它的建筑 and 结构给唐代的石塔建造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唐代时期也是佛教的鼎盛时期，统治者大多秉持崇佛政策，尤其是唐太宗时期和武则天时期，对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唐太宗儿子虽仍坚定不移地推行“道先佛后”的政策，但实际上与武后到泰山封禅，到灵岩寺拜佛。神通寺凭借其深厚的积淀与隋代奠定的基础，获得了皇家的直接扶持与民间信众的广泛捐赠，迎来了黄金阶段。唐太宗虽主张“三教并行”，但对佛教尤为重视，逐步开展大规模扩建工程。武则天时期，为巩固自身统治，大力推崇佛教，将佛教地位提升至道教之上，神通寺建立了更多的建筑，成为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佛教寺院之一。⁷这一时期，神通寺的文物遗存积淀进入鼎盛阶段，经实地研究发现，济南神通寺的分布有山门殿、大雄宝殿、师祖殿、法堂等几座主要建筑遗址，山门殿西侧有一个鼓台，大雄宝殿东南为伽蓝殿，西南为祖师殿，形成了完整的佛教寺院中轴线布局，现存具有柱础、瓦当、古井、等遗存也都集中于此，遗存的文物是神通寺分布的核心，以四门塔为核心，四门塔坐落于核心的宗教区东侧，是神通寺的标准建筑物，龙虎塔在四门塔西侧，与四门塔、千佛崖形成了三角分布，共同构成济南神通寺“三塔一崖”的核心景观。

龙虎塔始建于唐代时期陆续增建，最终形成现有形制。该塔为砖石混合结构的楼阁式塔，呈正方形布局，每边长约 4 米，通高约 10.8 米，由基座、塔身、

⁶ 陈海渊，宿永昌，张玉玉，赵蓉雪，〈隋唐佛塔建筑对现代高层建筑的启示——以济南神通寺内佛塔为例〉，《工业设计》2017 年第 1 期，页 125。

⁷ 马天成，《神通寺研究》（中国：山东大学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论文，2012）页 19。

塔顶三部分构成。基座有着龙虎、莲花等图案，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展现出盛唐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塔身每层辟有门窗，门外两侧分别雕刻菩萨、飞天、龙虎等，整体造型兼有隋代建筑的雄浑与唐代建筑的灵动，是唐代佛教建筑的典型特色。⁸

千佛崖摩崖造像的凿造始于唐初武德（618-626）年间，由神通寺僧人率先发起，后续得到地方官吏、僧尼及平民百姓的广泛参与，历经 60 余年的持续凿造，最终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摩崖造像群。千佛崖位于白虎山西麓的崖壁上，崖壁长约 60 余米、高约 20 余米，造像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最小的仅数十厘米，最大的高达 4 米不等。⁹千佛崖开凿于崖壁上，与核心宗教区大约 500 米。千佛崖造像的建筑样式和雕刻工艺，山崖南侧里面一共雕刻了上百多尊佛像。每一个佛像的人物形象非常饱满，一眼望去佛像端庄优雅，体现了唐朝繁盛时期华丽大方的审美特点。这些造像是在唐代最为兴盛。也正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发展时期，石窟造像艺术最辉煌的阶段。经过了千年的风吹日晒依旧保存完好。千佛崖的佛像有一个共同点。很多佛像都是单独雕刻的，佛像所在的小龕口子大多是圆拱形，非常朴实。¹⁰这些文物都构成了山东佛教文化的基础。其发展历程贯穿了佛教在齐鲁大地的传入、兴盛、衰落与复兴的历史脉络，从而见证了山东佛教文化的历史。

⁸ 何佳谦，〈唐代佛塔的艺术表现-以山东神通寺龙虎塔为例〉，《中国宗教》2024 年第 2 期，页 73。

⁹ 刘继文，《济南神通寺》，页 56。

¹⁰ 乔广岳，《济南市神通寺唐代千佛崖造像研究》（山东：山东艺术学院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论文，2017），页 12。

第三节 宋元明清，传承延续

金末至元代建立初，神通寺因为战火而荒废，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危难之际，道兴大师受命于此时，带领僧众清除荒草、砍伐枯木，长期辛勤劳作而不知疲倦。为中兴寺院作出杰出贡献的住持德云法师，更是率先垂范，带领众弟子不分昼夜，辛苦劳作。其后继任的德宝大师，常年身着破旧僧衣僧鞋，苦心经营，最后使神通寺的面貌重新展现。¹¹核心的文物遗存如四门塔、千佛崖等得以保存，后来道兴禅师主持重建，神通寺法属寺院已经 28 个，扩展至河北、邹县、滕州等地，甚至涵盖孟子亚圣庙，使得寺院影响力逐步回升，这一时期新增了部分墓塔遗存，丰富了文物遗存的类型。¹²尽管神通寺已经不像隋唐时期的鼎盛之势，但其凭借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民间根基，依然维持宗教活动的延续与文物遗存的传承，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遗存演变特征。

神通寺内有现存的碑刻十一通，计元碑二通、明碑五通、清碑四通，神通寺遗址东侧青龙山的半坡之上，矗立着一座宋代石塔，称“小宋塔”，亦名“福林救舍利塔”或“绍圣塔”。小宋塔是三层方形舍利石塔，建于北宋绍圣五年（1098 年），以天然青石作基座，塔身、塔檐及塔顶是由整块青石雕凿而成，高 4.83 米。¹³塔侧题记明确写道：“比丘福林于北宋绍圣五年为父母所造也”。福林俗姓郑，其父郑朝宗“素学儒经，称为长者”，母毕氏“持斋事佛，布施勤约”。父母去世后，福林与同为僧尼的姐姐福灯在神通寺内“就山凿石，成瘞坟以藏之，运磐石以覆之，起七级窣堵波以表之，龕阿弥陀佛以事之，求舍利以镇之”。¹⁴小

¹¹ 释界空，〈从神通寺兴衰史看崇俭戒奢的意义〉，《法音》2022 年第 8 期，页 29。

¹² 马天成，《神通寺研究》，页 20。

¹³ 刘继文，《济南神通寺》，页 55。

¹⁴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二七九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年），页 247。

宋塔的塔铭显示，撰写者是历城县尉潘卞，书写者是乡贡进士冯睿。从这两位文人的撰写可以看出，这座塔的建设并非普通百姓的个人行为，而是得到了当地官员和知识阶层的支持。这座塔把佛教的信仰实践与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相结合，僧人福林为去世的父母造塔安葬，就体现了佛门的报恩思想，这也就是宋代佛教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一个具体例证。神通寺在北宋时期虽然没有了隋唐时代那种来自皇家的庞大资源支持，但并没有因此衰落。靠着普通信众的真诚供奉的文化认同，寺院依然能够维持正常的宗教活动，并且还能创造出像小宋塔这样新的佛教文物遗存。

到了明代，善寺，动用了超过一万名劳力以及国库资金十万金，建成了辉煌的大兴善寺。明武宗尤其虔诚地信奉佛教，自称“大广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洪武五年十二月统计，僧人和道士共五万七千二百人获得了度牒（官方出家凭证），第二年新度僧道九万六千三百二十八人。永乐十六年（1418年），全国限定度僧数量为三万六千人。由于每年的人数不断增加，到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发放的度牒达到了二十二万份。自明太祖以来，每三年一次整顿寺院，考试佛经，发放度牒，以及对出家的年龄都有限制。因为佛教僧团发展过于迅速，遭受了其他宗教的攻击，到明世宗时，由于道士邵元节的鼓惑，于是发生了排斥佛教的事件。嘉靖九年十二月，撤去了文华殿中的释迦牟尼像。同年十月，废除了宫中的佛殿，并销毁了佛牙、佛具等一万三千余件。京城的寺院也大多遭到破坏。这时佛教文物遭受的损坏，虽然比不上唐武宗的会昌法难，但在精神上受到的威胁仍然很大！明代著名的僧人，都是临济宗的巨匠。¹⁵能够展现出明代佛教发展也奠定了基础，中央政府对佛教的管理趋于规范，同时儒家文

¹⁵ 释东初著，《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1974年），页17。

化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神通寺的发展正在持续，地方官员与民间信众多次出资修缮寺院的建筑，对寺内的核心文物遗存进行加固与修复，同时调整寺院的格局，建立了新的建筑，适配当时的佛教修行与民间祭祀的需求。

清代时期，清代神通寺的佛学发展是没有隋唐时期的辉煌，但其禅修是持续延续的，而且逐步与民间信仰深度融合，形成了禅修与民俗共生的独特格局。神通寺遗址内的康熙、乾隆、同治三通刻石，《重修神通寺碑记》载：“……寺重修在元世祖之至元、成宗之大德、明世宗之嘉靖……有僧人讳道远者……又思重修，众亦乐义举喜为捐助，或金饰伽蓝，或宝妆猊座，或带镇拓提，或粟贮香积，庙貌鼎新轮焕。”¹⁶康熙五十七年，当时寺院的修缮完全依赖周边民众的乐义举、喜捐助的自发支持，捐金银、捐粮食，使寺院可以鼎新轮焕，说明神通寺在缺乏皇家与官府扶持的情况下，依然凭借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民间信仰基础维持着基本运转。到了乾隆年间，《万世垂戒碑》载，寺院住持兴寿（道远之徒），无视寺院清规，并大肆挥霍寺产，当卖土地，盗卖树木动摇了寺院根基。¹⁷但在同治年间，神通寺又得到了重修。然而乾隆年间揭示了寺院衰败的真正根源，并非外部政策打压或者战争所导致，而是住持兴寿“无视清规、大肆挥霍寺产、当卖土地、盗卖树木”的内部管理危机，一位败家僧人的行为便足以动摇数代人积累的根基。到了同治十一年，《重修神通寺佛殿碑记》记载：“同治十年天降风雨，倾倒庙柏数株，里人遂定其价而沽之，仅得京跌九百余千，以为重修之资。”¹⁸在清末民初的时期，战火非常频繁，神通寺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而寿终正寝。则展现了民间社会在寺院濒临崩溃时的再次介入，因为风雨倾倒庙柏，里人将其售卖得“京

¹⁶ 马天成，《神通寺研究》，页 21。

¹⁷ 马天成，《神通寺研究》，页 21。

¹⁸ 马天成，《神通寺研究》，页 21。

跌九百余千”作为重修资金，说明即便寺院已破败不堪，地方民众仍将其视为共同的信仰资源与文化认同的载体，愿意以自救的方式延续这一座庙。

这三段碑文表明了清代神通寺的存续与衰亡是与地方社会相关，僧团内部的管理状况以及时代动荡的外部环境紧密交织。神通寺没有出现影响全国的高僧大德，但僧团始终保持稳定，秉持禅净双修的理念，坚持日常禅修和佛教的活动，同时需结合民间祭祀需求，开展祈福与超度等活动。每年济南神通寺都会举办盛大的佛事活动，周边民众都会前往上香祈福，祈求平安，这种活动延续了佛教的核心仪轨。进一步提高神通寺在民间的影响力，也为其传承发展赢得了广泛的价值基础。

第四节、现代化转型

近现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民国时期的动荡，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探索和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时代的转型调整，社会变革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发展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山东济南神通寺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现代化转型阶段。

民国时期（1912-1949年），是神通寺现代化转型的开始阶段，也是其面临生存危机与艰难存续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战乱非常频繁，封建帝制的瓦解打破了传统宗教的生存格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国内社会的动荡，使得佛教发展陷入整体低谷，神通寺也未能幸免。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依据《泰山志》等资料的记载，来到了神通寺踏查，被四门塔的古拙所震撼。他们仔细研究了塔内

的四面佛像，为我们描摹了 1921 年 9 月时的状况。塔内的四面佛，因为历代涂以塑土和不断修补，所以原本很难看到真实的面貌。¹⁹这段记载既真实反映了民国时期神通寺四门塔年久失修、濒临损毁的艰难处境。因战乱直接造成寺院建筑的损毁，部分清代新增的附属建筑、斋堂等在战火中被破坏，千佛崖摩崖造像遭到人为盗凿与破坏，部分造像头部与肢体被损坏，碑碣遗存也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因为社会的动荡导致许多僧众离散，寺院的香火逐渐萧条，原本稳定的僧团体系被打破，佛学传承也逐渐陷入停滞，仅有少数留守僧团坚守寺院，承担起核心文物遗存的维护职责。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神通寺仍迎来了现代化转型的微弱曙光，部分接受西方先进理念的有识之士，很多考古学者也开始关注神通寺的文物价值，意识到作为佛教东传重要载体的历史意义，持续开展了对济南神通寺的文物调查与记录。比如在民国时期，有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对神通寺进行实地勘察，记录了四门塔、千佛崖的基本现状，撰写了相关调查简报，首次从学术角度肯定了神通寺文物遗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²⁰通过神通寺的调查肯定其历史与佛教价值，首次确立了神通寺文物遗存的重要地位，推动了由荒废寺院遗址转变为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文物遗产，成为神通寺现代化保护与研究转型的关键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神通寺步入文物规范化保护的转型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确立“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保护方针，将神通寺纳入中国文物保护体系，予以重点扶持。1952 年，山东省文物管理部门对神通寺实施首次系统性修缮，把四门塔基座加固、千佛崖造像修复及遗址清理。1961 年，四门塔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²¹标志着神通寺文物

¹⁹ 陈明超，〈神通寺旧闻〉，《走向世界》2009 年第 3 期，页 62。

²⁰ 靳桂云，〈王献唐先生对山东文物考古事业的贡献〉，《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 年第 24 期，页 99。

²¹ 姜继兴，〈四门塔的历史〉，《城乡建设》2005 年第 12 期，页 78。

价值获得国家层面正式认可，获得明确政策支撑与制度保障。该时期虽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佛教的活动受限，但文物的保护工作从未中断，此阶段以制度现代化为核心，通过构建国家主导的文物保护机制与引入专业修缮技术，取代传统民间自发保护模式，实现文物保护的规范化与制度化转型。神通寺作为山东佛教文化载体的核心属性不会发生改变，所以部分文物遗存得以完整留存，为后续佛教与现代化转型奠定了核心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后到 21 世纪初（1978-2010 年），神通寺进入价值重估与文旅起步的转型阶段。²²佛教文化逐步复兴，文物保护和文旅发展开始初步结合，现代化转型的方式逐步加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领域逐步复苏，佛教信仰的自由得到保障。在文物保护方面，保护的理念与技术手段已经实现现代化转型。相关部门对神通寺文物遗存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修缮，采用新型防风化与防腐材料，对千佛崖造像、四门塔、龙虎塔等文物实施了科学的保护处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该遗址文物遗存的历史与佛教内涵。1992 年，神通寺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千佛崖摩崖造像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形成了文物保护的格局。随着中国的文旅产业起步，神通寺的文旅价值开始被挖掘，逐步走向文旅景区的转型，刚开始开发了简单的旅游线路，主要以文物观光为主，接待少量游客，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初步尝试。从传统封闭的传承模式转变为主动适应现代社会，通过现实交流和佛教活动等形式，实现了佛教的文化传播。神通寺的现代化转型度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路，从民国时期的艰难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规范保护，再到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认识到神通寺的文化价值，最终在新时代实现了全方位的转变。

²² 王建浩，〈山东济南市神通寺殿堂遗址的清理〉，《考古》1996 年第 1 期，页 53。

第三章：神通寺文物遗存与当代发展现状

第一节 文物遗存保护现状

在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在当代广泛普及，还有文旅融合持续推进的宏观背景下，济南神通寺文物遗存的现代保护工作获取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地方的文物保护部门与山东文化旅游部门协同构建了职责清晰且协同高效的联动机制，形成了“保护为先、文旅赋能、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工作的格局。围绕核心的文物遗存（包括四门塔、龙虎塔、千佛崖造像等）与附属的遗存（比如寺院的遗址、附属的碑刻和古道路等）的当代保护需求，相关团队系统评估各类文物遗存的保存现状与主要风险因素，慢慢构建起了许多日常巡查、文物的监测、预防性保护、抢险加固以及由自然环境在内的科学化保护体系。在此基础之上，依托文旅融合的发展平台，持续推进对佛教文化遗产的经义阐释与信众教育，进一步提升了大众的佛教的认知和共识。切实推动了佛教圣迹的如法管理与法脉延续，充分展现了兼具时代因缘与专业水准的佛教文物保护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²³当代的保护体系有所完善，专业的保障力度也很充足，正是济南神通寺文物遗存现代保护的核心优势。针对四门塔、千佛崖、龙虎塔以及其他国家级重点文物遗存，地方的文物保护部门主导建立了专项的保护工作组，并协同省内的高校以及文物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构建起“专家的咨询、专组的实施、常态的保养”现代化保护机制。在此就可以看到，能有效的保障了保护实践的科学严谨性与专业规范性。文物的核心遗存多为石质结构，长期处于济南南部山区湿润多雨以及昼夜温差较

²³ 夏青云，张泽刚，刘会东，〈文旅融合视域下文化遗产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四门塔文物群的文旅价值链延伸策略〉，《东方收藏》2025年第9期，页140。

大的自然环境中，容易出现风化、开裂等损毁问题，现代保护团队结合文物遗存实际的受损情况，针对性采用新型环保防风化材料涂抹、碳纤维加固、缝隙密封填补之类的先进技术，在不破坏文物本体，不改变文物原有风貌的前提下，有效减缓自然侵蚀速度，最大程度的保护文物完整性。

保护理念先进，实现保护与当代需求的有机适配。神通寺文物的现代保护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当代保护理念，济南神通寺严格遵循文物保护规范的基础上，主动适配现代社会发展与文旅融合需求，实现了文物保护与当代佛教文化传播以及文旅发展的衔接。通过优化文物展示形式，结合现代展示技术，让文物遗存的文化价值得到充分呈现，既保障了文物的安全保护，又为大众共同了解佛教文化，感受文物魅力所提供的便捷渠道，实现了保护与展示同样重要和文化与价值共生的现代目标。同时，保护工作注重佛教文化内涵的当代延续，在文物保护过程中，注重保留与传承佛教文化相关的核心元素，让文物遗存成为佛教文化当代传承的重要物质的载体。目前，神通寺文物现代保护虽仍有少量细节短板有待完善，但整体保护成效显著，有效实现了千年文物遗存的当代保护和有序传承。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根据文物当前的保存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采取对文物核心遗存进行精细化的修缮，同时建立了文物保存监测档案，对核心遗存的温湿度、风化程度以及结构的稳定性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跟踪，并加强遗址周边生态环境治理，以尽量减少自然侵蚀对文物的影响。但总体来看，神通寺的文物保存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附属的一些文物遗存的保护力度还有待加强，一些历史上遗留的损毁问题难以彻底解决，文物保存的长效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实现这处千年遗迹神通寺的长期稳定传承。

第二节 佛教文化的传承现状

佛教文化是济南神通寺千年传承的主要核心，目前济南神通寺佛教文化的当代传承呈现出了传统的坚守与当代适配并行且成效初显与短板突出并存的整体，依托于规范的现代僧团建设和常态化的佛事活动的开展，以及多元化的传承实践，实现了佛教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有序延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实践载体。

由于，神通寺庙是依山而建立的，周围环境十分清幽，山石众多，山林中的古树参天，神通寺周围山势环绕，地形山峦起伏。造像需消耗大量石料，摩崖造像的选址更需寻得大片崖壁，因而造像时首先考虑选于石料丰富的山区。跟据《魏书·释老志》载：“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²⁴，造像是佛教事业的附属产品，也需位于僻静清幽的地方。千佛山上不仅为寺院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和轻盈的氛围，也与佛教依山建寺的传统理念。在山间有着泉水，是与济南的七十二名泉相互呼应，为寺院的环境增加了灵动的气息。²⁵ 神通寺至今依然是很多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到这里朝拜或打坐修行的游客很多，有着黄色的格调，地位是代表着尊贵，是济南佛教的祖庭，黄色的银杏叶营造出非常宁静的氛围，是历代的僧人休养生息的地方。神通寺凸显了佛教寺院的宗教布局规范，又与周边自然山水深度融合，这种文物的规格遵循了佛教“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让宗教活动与自然环境实现和谐共生，不同类型的文物遗存各有专属空间、互不干扰，如今，济南神通寺被列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后代文物遗址保护工作的保护提供了天然便利，同时也为现代文旅开发打造“山水禅意”的特色体验，奠定了独特的空间

²⁴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5页。

²⁵ 马天成，《神通寺研究》（中国：山东大学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论文，2012），页10。

基础。千年古寺的历史变迁，不仅使该寺成为历史进程的见证者，更使其成为佛教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载体。

僧团建设作为佛教文化当代传承的重要支撑，已经形成了稳定有序的发展格局，也成为了传承佛教文化的核心力量。济南神通寺目前的僧众有二十人左右，都是经过佛教的教义学习与修行训练，具备非常扎实的佛教素养与良好的修行功底，严格坚守佛教传统修行理念是僧众的日常，并且每日开展禅修、诵经、念佛等常态化的修行活动，同时结合现代社会节奏与文明规范适度优化传统修行形式，注重修行本质的内涵，既坚守核心信仰又适配当代社会发展节奏，此外僧团定期都会组织内部进行研学交流，邀请各个省内的佛教界专家学者进行授课，解读佛教经典教义的当代内涵、探讨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路径，不断提升佛教的传承能力与专业水平，为佛教文化传承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佛事活动作为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当代实现规范化、常态化开展，既延续历史传统又贴合当代公序良俗，每年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比如围绕正月初一弥勒菩萨诞辰，象征着包容喜乐，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辰，是佛教的创始人，修心与修善的象征，六月十九观音菩萨诞辰，象征着平安健康，参与各样的佛教传统节日举办法会、诵经、祈福等活动，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佛教，发扬佛教的问文化，遵循传统的佛教文化，聚焦于慈悲向善和祈福安康的核心内涵，吸引省内外信众参与。济南神通寺遗址清理发现的罗汉头、弟子头、泥质菩萨宝冠坐佛等塑像残体及大佛坛以及小佛坛遗迹，²⁶印证了寺院历史上佛事活动的兴盛，当代规范化佛事活动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传承，为适配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僧团主动推动佛教文化与当代社会深度融合。结合寺院遗址内的文物遗存如碑碣、佛像、瓦当柱础等文物，挖掘

²⁶ 王建浩，〈山东济南市神通寺殿堂遗址的清理〉，页 51。

历代的僧团修行理念、传承历史脉络与佛教文化故事，整理形成地域特色佛教文化传承素材。当前，寺院还依托山水禅意环境与济南佛教祖庭地位打造特色禅修体验活动，设置短期的禅修、冥想体验、抄经练字等佛事活动，让参与者感受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且缓解生活压力，以体验式的方式传承扩大佛教文化的传播，把佛教的文化发展的范围更加广阔。

第三节 文旅融合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文旅融合的战略持续深化及数字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神通寺依托其保存相对完整的文物遗存与深厚的佛教文化资源，立足区域文旅发展市场的实际需求，逐步推进文旅融合的相关实践。通过借助现代化网络的传播热点实现济南神通寺带来影响力的初步拓展，神通寺在业态多元化探索与政策资源对接方面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效。然而，实践中仍面临若干突出问题，包括传播热度的可持续性不足、文旅产品体系的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以及文物遗存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之间的平衡关系是需要进一步协调。总体来看，神通寺当前仍然处于文旅融合进程中的探索 and 需要完善的阶段。神通寺文旅融合的核心成效，一直围绕佛教以慈悲之心引导人向善，在禅修意境中实现万物和谐共存，让佛教文化精神得以持续延续的根本宗旨展开。²⁷这主要体现于佛教文化品牌传播的破圈效应与禅意业态的多元化探索的两个维度。通过实践去促使千年佛教圣迹重新焕

²⁷ 广声，〈以佛陀的慈悲和平精神为指南 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法音》2024 年第 11 期，页 27。

发生机，也推动了佛教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有效传播，从而使济南神通寺成为济南南部山区文旅格局中兼具禅意底蕴与人文温度的特色节点。

在文旅传播上，神通寺依托佛教文化的包容性与亲和力，借助网络热点实现佛教文化发展的关键突破，让沉寂千年的佛教圣迹走出小众圈层，走进大众视野。在 2024 年，神通寺的景区内温顺亲人的流浪猫被网友广泛传播，被广大群众称为“猫猫寺”，恰好与佛教文化中“众生平等、慈悲护生”的教导相互吻合，猫咪的软萌与隋代古塔的庄重互相衬托，形成了“隋塔猫影”这种带有禅意的特色佛教文化的印记。这既暗中契合了佛教文化中“善待一切生灵，彼此和谐共存”的佛教思想，也有效缓和了济南神通寺原本过于庄重严肃的气氛。推动佛教文化以更具亲和力的方式触达大众，吸引大量年轻游客和亲子群体与宠物爱好者了解神通寺，为当地的佛教文化增添了活力。

在网络中相关的图文与短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扩散，让“慈悲护生”的佛教理念随热点传播深入人心。神通寺景区顺势推出《猫猫寺传奇》系列的短片、隋塔猫影的图片等产品，将佛教的禅意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实现了严肃佛教文化与柔性文化传播的有机融合，使每一件文创的产品都成为佛教文化在当下传播的一处微小的载体，让广大群众在不经意之间的触摸与注视中，感受到那份来自千年古刹的宁静与温和。此外，同年 8 月中国出产了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发售，山东济南神通寺中的四门塔、龙虎塔作为游戏取景地引发广大群众的关注，年轻玩家捧着游戏截图前往打卡，推动景区游客量与门票收入同比大幅增长，成功实现从小众的文保单位向现象级网红打卡地区的转型，让来自千年文物遗存在当代互联网时代焕然一新，推动了地方文化的普及和推动佛教文化的发展。济南神通寺随后积极探索文物和佛教的融合模式，持续丰富文旅的体验场景。在面

向众多民众开展考古科普和历史文化研学活动，邀请文物保护工作者在现场讲解，让民众在实践中了解佛教文化与文物保护知识。此外，还结合佛教传统节日与民俗文化，举办各类特色的节事活动，比如法会体验、民俗文化节等，从而丰富游客的体验，提升神通寺的吸引力。特别是 2024 年结合四门塔修缮竣工举办的祈福活动与文艺演出，又进一步提高了神通寺的知名度与民众的参与度。在佛教和禅修的方面，神通寺院有着清净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禅宗底蕴，每年定期组织禅修体验活动，邀请法师带领游客体验坐禅、行禅、抄经等传统修习方式。参与者在晨钟暮鼓中安顿身心，既获得了不同于普通观光的精神体验，也使佛教文化以更直接，甚至有着内在的方式触达人心。

第四章 结语

全文研究表明，济南神通寺作为山东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寺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经过长达千年的积淀，其文物遗存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推动下，核心文物保存状态整体稳定，神通寺内的四门塔、千佛崖造像等文物遗存得到有效守护。折射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困境与发展生机，同时展现出千年文物遗存的历史价值与现代的意义。济南神通寺在文物活态传承的基础上，将千年文物遗存与佛教文化、地方文脉进行了深度融合，依托四门塔、千佛崖造像、等珍贵的文物遗存，通过文物修缮、数字化展示、文旅融合等多种方式，让沉睡的千年的文物重新发扬起来，使文物遗存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佛教传承与现代的发展形成了相互融合、共生共荣的良好格局。

重视文物遗存的历史真实性与完整性传承，整理并完善文物档案，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艺术与宗教价值，又结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合理开发利用文物资源，将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播、文旅发展相结合，让文物遗存真正服务于社会以及民众，更对地方区域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事业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文旅融合发展中，神通寺借助网络热点实现并推动佛教的文化发展，神通寺以活态的传承为导向，以佛教文化为核心，将千年文物遗存与大群民众的生活相融合，借助网络的传播、文旅融合、节事活动等多元手段，将佛教文化逐步推向当代社会中。神通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实现了佛教文化的深度传承与地方表达。神通寺在坚守文物的真实性与佛教精神内核的前提下，通过对神通寺的探索，为佛教文化的当代延续与地方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资料:

专书

1. 刘继文,《济南神通寺》,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
2.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二七九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古籍:

1.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释东初著,《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1974。

期刊论文:

1. 公维章,张梅〈僧朗与泰山佛教史事编年〉,《泰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页14-20。
2. 释界空,〈从神通寺兴衰史看崇俭戒奢的意义〉,《法音》,2022年第8期,页29-33。
3. 王继训,〈北魏齐鲁佛教世俗化的展开〉,《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页10-13。
4. 陈明超,〈神通寺旧闻〉,《走向世界》,2009年第3期,页62-63。
5. 张丽,〈四门皆菩提〉,《走向世界》,2013年第8期,页54-55。
6. 靳桂云,〈王献唐先生对山东文物考古事业的贡献〉,《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24期,页99-101。
7. 姜继兴,〈四门塔的历史〉,《城乡建设》,2005年第12期,页78。
8. 陈海渊,宿永昌,张玉玉,赵蓉雪,〈隋唐佛塔建筑对现代高层建筑的启

示——以济南神通寺内佛塔为例》，《工业设计》，2017 年第 1 期，页 125-126。

9. 何佳谦，〈唐代佛塔的艺术表现-以山东神通寺龙虎塔为例〉，《中国宗教》，2024 年第 2 期，页 72-73。

10. 王建浩，〈山东济南市神通寺殿堂遗址的清理〉，《考古》1996 年第 1 期，页 53-60。

11. 夏青云，张泽刚，刘会东，〈文旅融合视域下文化遗产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四门塔文物群的文旅价值链延伸策略〉，《东方收藏》2025 年第 9 期，页 140-143。

12. 广声，〈以佛陀的慈悲和平精神为指南 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法音》2024 年第 11 期，页 27-28。

毕业论文

1. 马天成，《神通寺研究》，中国：山东大学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论文，2012。

2. 乔广岳，《济南市神通寺唐代千佛崖造像研究》，山东：山东艺术学院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论文，2017。